

清代侨寓徽商土著化的个案观察

——以上海嘉定望仙桥乡土志为中心

方光禄

(安徽省徽州师范学校, 安徽 歙县 245200)

摘要:上海嘉定望仙桥乡土志反映出的张氏土著化个案表明,大多数侨寓徽商的土著化过程,可视为建立在“占籍”基础上的双线结构。一是宗法层面上修谱建祠以壮大宗族势力的子族建构;另一是社交层面上扩大和巩固社会交流以提高社会认同度的网络建构。较多地参与地方社会事务管理,是基本实现土著化的标志之一。通过撰修乡土志书,土著化结论实现了固化。

关键词:清代;嘉定;侨寓徽商;土著化;个案

中图分类号:K8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7X(2009)02-0011-08

关于侨寓徽商的土著化问题,学者曾作过较为细致的探讨。王振忠教授认为重修宗谱、重建宗祠对于侨寓徽商的意义重大,是其疏远乃至最终脱离原籍的主要途径。^{[1]54-66}李琳琦教授赞同此观点。^{[2]196-200}唐力行教授则通过侨寓苏州的歙县大阜潘氏逐渐成为当地望族的个案研究,进一步发现缔结婚姻在其土著化过程中的作用。^{[3]78-91}这都为本文的继续探讨奠定了基础。

明朝中后期以来,上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是徽商集聚的重要地区,也是众多徽商最终实现土著化愿望的热土之一。上海郊区嘉定望仙桥分别撰修于清末、民初的《望仙桥乡志稿》《望仙桥乡志续稿》,就较为详细地记载了侨寓徽商之一张氏族人的相关事迹,为我们勾勒其土著化进程提供了基础性的资料。由于张氏在歙县原籍难属望族,虽在望仙桥定居百余年后,成功融入当地社会,且具有一定社会知名度,但与大阜侨寓苏州的“贵潘”或“富潘”相比,显属社会低层。事实上,侨寓他乡的徽商,绝大多数属于这一类型。因此,对于该个案的深入了解和剖析,有助于我们对徽商土著化问题讨论的深化和认识的全面。

一、望仙桥张氏源流、世系及其精英

望仙桥张氏,原籍歙县定潭,明代曾任广信太

守的张仕镛之后裔。《望仙桥乡志稿·古迹》“紫薇轩”条:

“其先世西潭副使,曾谏武宗南巡拜,廷杖。官终广信太守。”(注:此处笔者对校点本句读有订正)^{[4]古迹}

民国许承尧《歙县志》:

“张仕镛,字景周,以进士除廷尉评事,时有冤狱,仕镛片言折之,一时称服。武宗南巡,仕镛抗疏谏止,廷杖,谪南京刑部照磨。嘉靖即位,诏复原职,出守广信,升浙江按察副使。”^{[5]人物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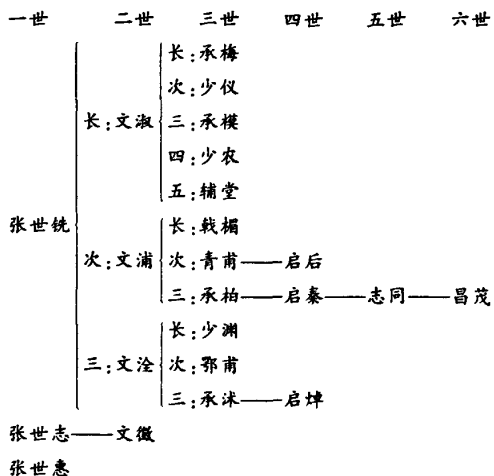
笔者实地调查得知:元末前后,张常德从今歙县森村乡绍村迁居定潭,为定潭张氏始迁祖。生子二,长寄安,世居定潭;次寄养,迁浙江乌石山。寄安生子三,长继祖,次新保,三真住。其中继祖之后裔有一支迁嘉定。从明代仕镛之后,部分行辈字号排列如次(定潭张氏现以祥字辈人为多):

……仕、良、国、立、以、元、光、大、世、文、承、启、志、昌、安、祥、吉、兆、邦、荣、永、忠、绍、孝、友、万、年、芳。

始迁望仙桥的乃张仕镛八世孙张世铤(号不虚),时约乾、嘉年间。张世铤兄弟四人,他与三弟张世志(号六亭)、四弟张世惠(号松溪)同因经商而迁望仙桥。依据《望仙桥乡志稿》中有关记述,整理得出张世铤之后部分世系如下(以张世铤为一世):

收稿日期:2009-02-27

作者简介:方光禄(1965-),安徽歙县人,安徽省徽州师范学校高级讲师,研究方向为徽州社会史。



约翰大学之聘,期年而赴修文之召矣。”^{[17] 91}

二、望仙桥张氏的土著化努力、成效及其固化

张氏的土著化,必须建立在国家户籍制度许可的基础之上。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之前,徽商为其子弟能在侨寓地参加科举考试,一般是向政府申请“商籍”。或有“挈家人籍”者。“人籍”需要一定的条件,即:

“(侨寓商民)其实有田户,坟墓在江南,与入籍之例相符者,准其呈明于居住之州县入籍。”^{[18] 99}

嘉庆《如皋县志》卷4说得更清楚:

“其客户、外户有田地、坟墓二十年,听于所在隶名,即编为户。”

文化素质颇高的张世铤,非常清楚政府的规定。他在闯荡商海30年后,决心在望仙桥度过后半生时,就大量购置房产、地产。虽他在世之时未必能入籍嘉定,但至少能为儿孙奠定根基,故其努力倾向相当明晰:

他看中王氏别业“醉雪仙窠”,购后“葺而扩之”,“改署东园,又称梅花小墅。”该园规模宏大,“卅亩梅花一草堂”,中“有六山、石台、香雪坞、梅隐居、碧云深处、邻竹山房、玉照轩、听雨榭、烟香屿、听鱼矶、孤山、药圃诸胜”。^{[19] 28}不久又购钱少詹大昕故宅两处。一地邻东园之“碧云深处”,“家君(引者注:张世铤)惜之,因谋以归”,改葺为书室,颜曰“留耕”;一在桥西中市,张氏购后一度出租为药店。随后,其子孙大兴土木:文淑建“百砚楼”,文浦建“梅竹吾斋”,文淦建“白云楼”“静观自得楼”,少仪建“紫薇轩”。虽乡志未提及张世铤购置田产,但从上述罗列,也不会对张世铤同时也购有一定数量的田地置疑了。

当不少徽商为达到“人籍”的政策硬杠,不顾家乡父老“吾徽有千年祖坟,千人祠堂,千丁乡村,他处无有也”的规劝,甚或“假令迁徙而子孙长保其丰厚犹可,否则流移不可回矣”的恫吓,“與其祖、父骸骨葬于他乡,不稍顾惜”,^{[20] 106}张世铤似乎更为稳重和耐心,他只在东园西北隅“自营生圻”,而其三弟和四弟,虽身居望仙桥,却“归葬故里”。兄弟一分两处,故里侨居相兼,也许能给后代以更大的选择空间。

相对于故乡定潭,张氏在望仙桥人地生疏。稳定和扩大张氏的生存空间,必须依靠强大的实力,即宗族力量。从侨寓第二代,张氏就依据故里成熟的宗法制度,开始了复制与母宗相似的子宗的努

在该志中,尚有张氏族人承槐、承枋、启宸、启鹏及其子志仁等人,因不能明确其血缘关系,难以在上图中体现。

望仙桥张氏族人中,最重要的人物是张世铤三兄弟、承柏、承梅、启秦等人。

“张世志,字存中,号六亭。随兄不虚贾里中。性旷达喜饮。脱口吟小诗,时发天籁。工写生,虾蟹最神妙,求之者载酒集,既醉,信笔所之,顷刻数十纸。居东园久,一草一卉多其手植,随意咏之,集称《报花开》。”

“张世惠,字象三,号松溪。不虚四弟。喜吟,著有《松石山房诗钞》。工山水,入倪黄之奥,写古松尤妙。擘窠大书得朱紫阳笔法。先后居东园最久,亦赁钱门唐静逸轩中平居。以诗书自娱,爱莳花卉、养盆树,得朱三松之传。与外冈郁俊庵最契洽。年七十三卒,与兄六亭并归葬故里。”^{[14] 人物流寓}

“张承柏,字厚甫,自号痴九,望仙桥人,诸生。诚朴伉爽,才气佚宕而癖于诗,其为诗,若寝食之不可以已。独恶人谈科举文,闻则掩耳走。曾授经耕余圃,暇辄与里人士相唱和。无何,就馆沪上,以疾卒,邑人黄宗起为里传。”^{[16] 卷九}

“张承梅,世铤孙,字宰和,号默山。邑诸生。幼聪慧,识孝弟字(孝悌)。举止温润,得祖父欢心。年十一应童试,下笔多刻挚语。少长刻苦自励,究心濂洛关闽之学。从周云卿、王未亭、杨筠轩诸先生游,皆以读书真种目之……父命课诸弟,友爱交至。年二十七卒。有《直庵偶存草》选入《嘉定诗钞》。”

“张启秦,字孝臣,别署非子,承柏之子。廪生。淹贯经史、词章,尤精小学,书法精篆、隶、八分,擅篆刻。善饮,饮不至醉。教授里中,能尽启发之妙。处事严明,待人和藹。理乡政,人咸敬惮之。光绪中叶,建广仁堂三楹于城隍行官之西。宣统三年,受上海

力。先是张文淦撰《定潭族谱》。尽管内容不详,但依其名称,可能仍以故里世系为主,因此时张氏在望仙桥立足未久,人丁不繁,撰修族谱的意义更在于树立一面精神旗帜,让远离故土的新生代勿忘木本水源。到了第三代,同辈兄弟成人者10人,人丁兴旺。与定潭的空间及心理距离日益拉远,于是张少渊率众创立望仙桥张氏分祠。他在《仙溪张氏分祠记略》中写道:

“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我张氏自先祖赠公由定潭迁仙溪,历世三传。虽故里自有宗祠,千里奉祔,不惮迢远,而仙溪尚无分祠,霜露怵怛,情所难已。循庶人祭寝之例,未免卑褻,且神人杂处,亦非闕宫清静之谊;择地创造,力所不及。先茔东偏向有玉照轩一所,兵燹后栋梁摧塌,因旧改新,措力较易,作为分祠,奉安粟主。规模虽嫌稍隘,惟冀先灵既妥,后嗣浸昌,廓而大之有日耳。我兄弟各宜勉,成此久远之举,以启百祀无疆之休。祀产及奉祀规条,俟分祠落成后再议,经费量力各捐,仍有不足,按丁出钱可耳。”^{[14]144}

可以想见,分祠初创,尚属简陋,但其精神意义重大,它标志着—个子宗基本脱离母宗进入了独立发展的新阶段。望仙桥张氏子孙逐渐拢聚在分祠周围,依靠宗族力量,维护着共同的利益。

至迟从明朝中期始,上海一带就成为商界要地,四方商人往来贸易其间,社会群体的流动性很强。因此,张氏族人要想得到地方社会的普遍认同,就不能运用徽州本地宗族间相互排斥、争竞的传统方式,而是努力以开放的姿态,在碰撞——沟通——交融的过程中,建立起普遍的、和谐的社会网络,使以血缘为首要特征的群体过渡到以地缘为首要特征的群体。在张氏建构地域性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体现出层次上的鲜明特征。

在基础层面上,遍行义举,注重社交普遍化。

同居一地的人们,为抵御“水、旱等自然灾害以及异国人侵略的威胁”,“必须采取协同行动来保护自己——如筑堤、救济措施、巫术及宗教等活动。”^{[14]105}张氏族人在侨寓地既敬神又助人,即分别借助神缘、地缘来建立普遍的良好人际关系。敬神是指热心于神灵祭祀的相关活动。如张文淦曾创“流芳会”附祀里中贞节烈妇:

“前此,邑中有采访众节孝之役,诚斋不避寒暑,足趺口痛,遍历村里,既以请于朝,建坊立祠于城,而乡民村妇或未之见也。议设分祠,费无所措。会斯堂(注:广仁堂)落成,遂以近里中得旌之节烈贞孝妇女若干人,大书供奉于其中。春秋二节,司总偕里人羞频繁之敬,将以耸愚顽而厚风俗焉。”^{[14]144}

望仙桥之东、巨门之野,“向有小庙一所,相传肇自康熙朝”,俗祀五通神,香火不衰。道光甲辰(1844年)中秋前四日,蓬溪胡生因妻病,以为为此庙神所害,遂持挺毁坏该庙。望仙桥村民一片哗然,认为庙存已久,有利无害,说其越境为祟,是诬蔑神灵。张文淦与胡生之父相熟,往询之,得其实。乃出己资重建小庙,并撰《安巨门野庙神文》一通。此举,既使“禱者酬者”依然有所,又使村落间可能激化的矛盾复归于缓和。

热心于服务民众生活的义举,更能博取民心。如施棺代葬等慈善事业,素为张氏关注:

“邑城旧有存仁堂施棺代葬之局,而乡民距城远者,暑月恒苦不便。嘉庆十四年,张不虚先生铤始于望仙桥立广仁堂,施棺代葬。先生歿,其伯子仪斋文叔、仲子忍斋文浦勉勉勿坠,十有余年,力渐不支,屋亦就圯。季子诚斋文淦不忍是局终废,论父兄之绪,劝募同志,量力伙助,爰率其仲子瀚及淳、源等重新其屋,以为之倡,瀚复捐地以扩义冢。道光二十五年九月,规模既定,条约维新,地限十有一图,恐广则弗给也。”^{[14]144}

到了光绪中叶,张世铤曾孙张启秦又“建广仁堂三楹于城隍行官之西”;直至民国,“广仁堂历年夏秋间”,还“施送时疫药品”。^{[17]144}

太平天国运动,“嘉定受害甚酷,西北两乡尤烈,庐舍存十之一,人民存十之二,饥饿濒死,皆无人形。”虽李鸿章曾派员赈济,民众稍延残喘,但“赈停后,依然无食。”“年壮者犹能食力于沪,其老弱残疾者,既无室庐,亦无炉灶,露宿风餐,呼号道路”,其景可悯。张青甫、张养梧、张少仪遂设“留养局”以施粥:

“浩(引者注:青甫)不自量力,率门生赵莪、儿子启后转辗劝募,得抚恤局委员王巽嵩比部、程藻安寺正相助,得以集事,于癸亥六月,开厂钱门塘、望仙桥两镇。二十二天内人民年五十以上、十五岁以下,及疾病者,不论男女,均与编号排榻点筹放粥,每日两餐,規制秩然。”^{[14]144}

限于“经费支绌,难于经久”,主事者常感“心长力短”而“仰屋频嗟”,只能勉力支撑。

对政府常设利民机构的运作之弊,也见张氏族人毅然挺身,为民呼吁。光绪末年,鉴于平糶局米价昂质次,张启秦愤然上书:

“前次末期之米掉杂太甚,余者既皆苦之。不料此次着潮太过,色既极劣,斤量又短十多斤。外间价已渐减,此次反又增加,以故贫民情愿余非平米,色色上算,万不愿余平米。名似沾公利,实则暗亏不少,遂使领出之米强半废闾于各经手家,不知何日

始能了结……执事办一邑大公，诚未便以一区概全局，仆所以向不欲多为之词，固知办公能尽如人意之难也。然因之而竟使一区向隅，于公义亦殊不合……万望草莽熟处，竟此全功，俾贫民得沾实惠，公款不致虚靡，则谣诬自定，即公德不细。”¹⁷¹⁷

新学渐成趋势，张启秦等又勉力推进：

“二十八年(1902)，张启秦设望仙桥蒙学堂于张氏留耕堂。”

“三十年(1904)，仙溪蒙学堂改为仙溪公立两等小学，张启宸为校长，经费由镇商筹肉捐等以补助之。”¹⁷¹⁸

至于修桥补路，张氏也常有所为。望仙桥市南跨顾浦有一桥，名“迎恩桥”。此乃张世铎筑以自寿，并命其子张文浦拟联句镌于立柱。此地后成望仙桥十二景之一的“红阑放鸭”。其子张文淦的善举在地方也颇有影响。《望仙桥乡志续稿·人物》记杨凤沚事迹时，也不忘写上：“邑中善举必商之(引者注：杨凤沚)，张诚斋、钱益斋两先生协力成之。”

民国初年，张氏后裔热心公益的义举也还不绝于史。如：

“东南战争(引者注：指1924年江浙战争)绵亘月余，本乡居民流离载道，旅沪同乡张启宸、毛经学等组织西乡兵灾善后会，联合他埠同乡为将

伯之呼。一时仗义输财者，不乏其人。救护船(陆友白、钱仍膏等，由上海出发，回乡救护)、灾民接济所(张浩如、杨夏汾等在常熟组织)，相继成立，赖其力也。”¹⁷¹⁹

“吾乡市河顾浦日久淤塞，居户艰于洗濯，商旅困于运输，乡人士屡议浚凿，困于资而未果也。甲子春初，县议会有浚河之议，毛先生西壁(经学)归谋于张先生现治(启宸)，预计应浚工程，提出诸议案得可决。”(此议于次年实行)

“丁卯之役，乡议事会议长张启宸商得其(引者注：指曾斥巨资组中国红十字会嘉定分会横泾办事处的里人曹汝霖)同意，又组收容所于镇南乡立第一初级小学校”。¹⁷²⁰

经常性的扶危助难，迅速让张氏获得良好的声誉，奠定了张氏融入当地社会之基础。

在中间层面上，交游同道，保证社交常态化。

望仙桥一地，人多杂处。张氏始迁一代，文化素质颇高(张世铎诗赋常见；张世志能脱口吟小诗，又工写生；张世惠喜吟，亦工山水)，故极注重与当地社会上层人士之交游。这批在当地颇有知名度的人士，对于张氏来说，是一笔能助其迅速土著化的重要社会资源。从下表很不完全的张氏族人主要交游表就能看出其价值。

表1 张氏族人主要社会交游情况一览表

序号	姓名	籍贯[住址]	身份	交游情况	资料来源
1	曾芝园	望仙桥	不详	里中耆宿，张世铎为其《抚松图》题诗	《志稿·人物》
2	王一清	望仙桥	国学生	“喜与文士交”，老屋“醉雪仙窝”售与张世铎	同上
3	王一飞	望仙桥	不详	“耽吟咏，喜交游”，“晚年与张松溪为忘年交，诗筒画简数日不接，辄相寻云。”	同上
4	黄小园	南漳瀕	不详	父监生，“事张先生子渊”。	同上
5	杨仁凤	望仙桥	不详	乡饮宾杨大吕犹子。张承柏有赠诗。	同上
6	杨筠轩	望仙桥	举人	张承梅之师。“居邻东园，梅花盛时，往往借宿玉昭堂中，一时名士，裙屐逗欢。”	同上
7	周云卿	昆山角里	诸生	张承梅之师。周故，张文浦“哭以五百韵，合刻《怀靖子挽诗》一卷，复偕同人梓其遗稿曰《鬻余吟》。”	同上
8	王末亭	望仙桥	不详	张承梅之师。“来者四集，多知名士”。	同上
9	朱炳文	野猫洞	国学生	“究心形家言，悉其奥旨。”“东园、六山诸胜，经营点缀，时与其事。”	同上
10	卫之松	卫家角	廩膳生	精切脉法，用药精慎。尝集于东园猜诗。	同上
11	孙 玘	太仓	诸生	博学，喜吟咏。张少渊昆弟从之游。	同上
12	朱右曾		太守	与张文浦昆季并笃好。	同上
13	王文林	太仓	廩生	工诗。与张文浦交好。	同上
14	王步瀛	外冈	不详	工诗、古文。“与张子远、子渊昆弟为诗酒之盟，月必再三止宿静观自得楼。”	同上
15	徐 经	不详	观察	“周立春之乱，携其少子今协揆郝号颂阁避居张氏白云楼，时郝甫十余龄也。”“经孙致祥，字季和，从张少渊先生游。”	同上

序号	姓名	籍贯[住址]	身份	交游情况	资料来源
16	陈德基	昆山	诸生	工诗画。曾馆卫家角既勤家。养梧(张少渊)书。	同上
17	孙廷鏞	阳湖	不详	“庚申苏郡陷,挈眷避地以张氏以居。”	同上
18	钱十兰	望仙桥	知州	张世铎兄弟四人,与钱十兰等时相唱和。张文淑“为钱十兰先生门下士,十兰晚年写件,张先生捉刀者为多。”	《志稿·艺文》 《续稿·杂录志》
19	潘道根	娄塘	不详	作《跋子渊张先生辞举孝廉方正诗册后》。	同上
20	洪遵规	不详	贡生	工诗、古文、词。与张文淦有诗相唱和。	《志稿·古迹》
21	黄毓骥	西漳滨	不详	黄筑东湖草堂,南壁由张青甫画墨梅数枝。	同上
22	姚承祖	钱门塘	不详	业医,精痘科。尝入东园诗社。	《续稿·人物》
23	徐彦章	钱门塘	诸生	能医,善诗。道咸间,里中东园有诗社,彦章往来酬唱。	同上
24	赵莼	钱门塘	不详	诗文有大家风。张文淦及门弟子。	同上
25	杨钧	海门	不详	善画,得张启泰知遇,下榻非园几一年。	同上
26	王德俊	望仙桥	商人	性豪爽,遇黠者面斥之不讳。与张孝臣杯酒言欢,日以为常。	同上
27	吴挹清	望仙桥	使臣	张启泰有《送吴君奉使义大利叙》。	同上
28	童容斋	钱门塘	不详	张文浦曾寓其“静逸轩”并作诗。	《钱门塘乡志》卷4
29	朱曰佩	钱门塘	岁贡生	张文浦曾作诗《赠石民先生》。	同上
30	朱绶卿	不详	都尉	张承柏有诗《送朱绶卿都尉侍太夫人移居耕余圃》。	同上
31	卫绳武	钱门塘	国子生	张文淦曾为其“孝友堂”作诗。	同上
32	章树德	黄渡	诸生	性耽吟咏。与仙溪张承松提倡风雅,积诗数百首。	《钱门塘乡志》卷9
33	童奏云	钱门塘	诸生	童著《劫余编》,张承柏为之作跋。	《钱门塘乡志》卷11
34	许雨田	侨寓钱门塘	上舍	同治七年(1868)“谷雨后三日,耕余圃牡丹盛开”,许“邀集远近名流,置酒高会”,张承柏长歌记其事。	《钱门塘乡志》卷12

表中可见,张氏交游甚广。地域上,既有土著,也有侨寓;身份上,既有政界官员,也有文艺名家,甚至有“三教九流”之嫌的医、卜者。当然,除了乡志留其名者,张氏族人的交游面还应该很广。如:张世铎扩建东园成,曾“征海内名人诗文书画,各成卷册”。此外,张氏还以结社的方式,将部分交游关系相对固定化。张青甫昆季曾结“煎茶诗会”。时天福、陆少唐、仁龙盛执菊于鸭阑,陆季云首唱《咏菊》三十律,避乱者如吴门孙小渊、孙吉甫,买木棉者如常熟周杏桥,侨寄者如前典史唐玉樽之子惠卿,黄渡如章清甫,钱门塘如徐浩亭、徐敬亭、童翼臣,嘉定

城中如浦吉卿、王甄仲、朱东侯,安亭如葛平侯,天福庵如褚月樵,近地如陈炳堂、陈半耕、洪一山,钱穀人元震暨张氏甥程芝轩诸人,皆参与其间。时虽太平天国乱后,文人交游唱和兴致不减。正如《柬同人拟作煎茶诗会》所言:“时艰合有偷闲客,三里澄波脉脉通。”亦可想见承平时期“名流觴咏殆无虚日”之盛况。

在核心层面上,择贤联姻,促进关系紧密化。

与当地望族,世家缔结婚姻,则是社交网络的核心层次,不仅扩大家族社会力量,还使土著化的实现更具姻缘之基础。就乡志所见,张氏族人的—些婚姻关系可见下表。

表2 张氏族人主要婚姻关系一览表

序号	联姻者	籍贯[住址]	身份	婚配情况	资料来源
1	朱瀚	父曾馆 望仙桥	不详	太守朱右曾子。朱曾馆张氏惜分阴阁,与张文浦昆季笃好,一门多从授业。因以女弟妻先生子瀚。	《志稿·人物》
2	朱元治	同上	郎中	太守朱右曾次子。张文浦又以女妻朱元治。	同上
3	严昉	寓望仙桥	邑诸生	“喜吟,精医。张承柏之岳父。”	同上
4	程应杓	同上	邑诸生	妻张青甫兄张承模女。	同上
5	俞嘉谟	镇洋	诸生	“嘉谟为张味甫先生婿,时从讲学于留耕书屋。”	同上
6	陈南煨	角里	诸生	“不事生产,善鉴古碑帖。馆张氏东园玉照轩,后即以女妻张徵君少渊。”	同上
7	顾氏	不详	不详	张承沐妻。年二十九寡,抚孤启焯成诸生。	同上
8	杨氏	不详	不详	诸生杨契贤女,监生张启鹏继妻。壬戌四月二十一日赴水死。	同上

序号	联姻者	籍贯[住址]	身份	婚配情况	资料来源
9	王某	不详	不详	张少渊姐妹张容甫嫁王某,其子王祖畲1864年中进士。	《志稿·艺文》
10	方瑞荃	不详	不详	张文淑妻。著有《药香余咏》。	同上
11	陆咏荃	外冈	诸生	父季云与张青甫友善,其为张氏婿。应州县试列前茅。	《续稿·人物》
12	吴氏	戩浜桥	不详	孝廉吴林之女,张夫人。精武艺。	《续稿·杂录》

表中所见,仅是张氏族人百余年中婚姻关系之冰山一角。但其婚姻选择的倾向已很明显,即注重联姻家族的文化水准、社会声望。表中12例,诸生及官僚家庭9例;另有贞节名及著作者,显同属大户之列。尽管乡志入选者在张氏实际联姻者中只占很小比例,且入选标准偏向社会上层,但张氏族人的这种倾向是难以否定的。

从张世铄开始,经过世、文、承三辈人近百年的土著化努力,张氏族人渐有所成。其重要标志之一即第四代启字辈,获得了较多的以当地代言人身份参与地方社会事务管理的机会。当然,不能否认,前清垮台、民国建立,地方行政管理模式出现巨大调整等时代背景,为其实现上述目标提供了契机。

光绪末年,预备立宪新风劲吹。嘉定西乡一些士绅谋求地方自治。宣统二年正月,历经波折之后,望仙桥选举厂董、议董。张启秦等5人当选;三年正月,张启宸、张启秦分别当选甲、乙级议员;二月,张启宸又当选议长,张启秦当选董佐;民国元年四月,乡议会改选,张启宸未留任甲级议员,张志成当选乙级议员;二年四月,乡议会改选,张启宸当选甲级议员、议长,直至三年二月自治取消。民国十二年七月恢复自治时,张志同又当选甲级议员。“所提出者均深合民生要旨。今春,苏、沪底定,本乡国民党部拟举为民政委员。”黄守恒在光绪三十一年发起组织嘉定西路预备地方自治会的《公启》中,“凡我同人,生长是乡,谊关桑梓”“冀有以造福于乡里”等语,便可看作对张氏等侨寓者的地域认同。

战争突临,也是张氏族人介入地方事务管理的机会:

“民国十三年(1924)八月,江浙风云日益险恶,乡议长张启宸,乡佐毛诒植召集各界,商议维持之法,议决招募临时警察,委陆整为所长。战事既开,战地难民投奔者众,大军又往来如梭,公者迫供应,私者强搜索,警所不能维持,乃由杨大璋集同志组织保卫团以代之,推张志抗总其事。”

“十六年(1927)三月二十日,革命军莅沪。直鲁军退市河,顾浦为其路线之一。二十一日晚间,直鲁之溃军络绎而来,次日自晨至暮,过者盈万。事前,张志同发起组织保卫团,推张志周(百鲁)、殷振声(玉堂)为干事,至此遂从容招待之。”^[17]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望仙桥乡志稿》中,张

世铄一支始终被当作是里(望仙桥)人,而张世志、张世惠的传,则放在“流寓”栏内。也许这与他们虽长期或居东园,或赁钱门塘静逸轩以居,但始终没有人籍望仙桥、后又归葬歙县定潭故里有关。

张氏族人及其姻亲对于撰修乡志也倾注了满腔热情,这是将张氏土著化结论给予制度化、正统化的重要途径。《望仙桥乡志稿》是张启秦在光宣年间所编。当时,他与钱门塘童凌苍相约合编嘉定第三乡志,未脱稿而于1912年卒于时疫。稿本置于新宅张氏族人处,毁于日寇战火,幸其门人、张启宸之婿杨大璋录有副本,而又为张启秦之外甥杨世益所抢救,今人方一睹其真。《望仙桥乡志续稿》则由杨大璋于1927年编纂,其部分原始资料之搜集,是与其岳父张启宸共同完成的。因此,这两部望仙桥重要的乡土志书的完成,都与张氏族人及其姻亲有关。他们在乡志中较多地反映了侨寓的张氏族人(尤其是定居的张世铄一支)相关情况,也是能够理解的。

三、张氏与原籍的联系

虽然张世铄及其后裔一直为融入侨寓地社会而努力,但在前三代的百年中,望仙桥张氏与歙县定潭原籍还保留着一定联系。

首先,侨寓的张氏族人内心深处,原籍的人文、风物,如先祖故物、建筑,甚或故里名称,时常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其精神依托。

广信太守张仕镐一直是张氏后人的骄傲,他使用过的一方“素风砚”就由张世铄继承。张世铄搏击商海多年,事业有成,但他始终认为:“挟策”营商并非“千世意”,随身携带并经常摩挲的这方“素风砚”,经常提醒他让儿孙读书。故在“颜曰留耕”的书室落成之后,他颇有感触,曾“赋示儿孙”,表达了这样的思想:

“萧萧尘鬓感离居,投老怀安计已疏。风雨他乡聊补屋,江湖卅载久抛书。……心远何妨居近市,身闲其奈岁流波。好凭方寸良田在,勤动无虞恶岁过。素风犹自守空囊,长物摩挲旧泽长。挟策本无千世意,耽书总有逐时芒。……比屋书声宜子弟,一窗花气惬昏晨。长年自笑浮家客,小驻偏忘卧雪身……”^[18]

在这里,先祖的一方砚台,既是一种怀念,更是一种遗愿、一种嘱托、一种激励。

长子文淑显然继承了张世铨的思想,他尤嗜收藏古砚,文天祥、唐寅、王锡爵等名流使用过的砚台,与素风砚一道均收藏在他建的“百砚楼”。又曾授五子砚各一方。其弟文浦《某竹吾庐诗钞·题百砚楼示诸侄》有记:

“吾家眠云子,癖砚逾米颠。自侈富翁富,百二获宝田。累累端州石,斑斑秦汉砖。罗列满几榻,摩挲度餐眠。蓄财用贵博,食力功宜专。膝下五男子,各授砚一焉。一砚足一生,此生无息肩。虑无越畔讥,犁铁何时穿。砚山高一寸,上与青云连。慨焉念祖德,素风五百年。”^{[14]44}

文淑歿后三载,“子若孙遵治命,析而藏之儿辈”。后来,“贼(引者注:太平军)扰江南,家山破碎,藏砚被劫,荡然一空。”孙辈张少仪、张青甫“于残砖破瓦中寻得汉瓦当三、汉砖一及文信国、玉带生、杨忠愍、王文肃诸砚,质尚完好,藏之旅篋,足壮行色。”直至全国解放,幸存各砚,方由嘉定博物馆保存。此时,离张世铨已有5代了。

歙县定潭有张仕镐故居,曰“清白第”,明正德年间徽州太守张芹题写。“清白”乃张仕镐任职大理寺时皇帝封敕中的评价用语。堂名“承恩”,后轩曰“紫薇”。此第之所建,是张氏宗族的极高荣誉。作为张仕镐的直系后裔,张世铨及其子孙自然十分自豪。故在望仙桥定居后,张世铨之孙张少仪仍然以“紫薇轩”名其斋,以《紫薇轩诗存》名其诗稿,遗稿亦名《紫薇轩眷稿》,以示木本水源。

定潭村地处歙县南,昌源河从东北向西南穿过村前。村西有山,曾发生巨大山崩,使河溪改道,殃及村落。村民为祈求山川安定,取山名“定山”;村前有深潭,因此村落名“定潭”,又名“定川”。张文淦虽在故里生活时间可能有限,联系也未必经常,但还是选用故里村名,将自身所居名之“定川草堂”,又将其诗集28卷、文集8卷,称《定川草堂诗集》《定川草堂文集》。故乡情结之浓郁,由此可见。

其次,在宗法礼仪上,早期侨寓的张氏族人基本遵从回乡谒拜宗祠、展墓祭祖的规矩。徽州“重宗义,讲世好,上下六亲之施,无不秩然有序。所在村落,家构祠宇,岁时俎豆。”^{[13]166}“出入齿让,姓各有宗祠统之,岁时伏腊,一姓村中千丁皆集,祭用朱文公家礼,彬彬合度。”^{[12]44}“外出经商者,“近者岁一视家”,^{[13]166}亦“有数岁一归者”。^{[14]166}回乡目的,既为拜访友朋,更为祭祖展墓。各族无不如此。望仙桥张氏自然也未能例外。《望仙桥乡志稿·人物》在介绍张承梅时,就有这样的记述:“张承梅……故籍歙县,

从两叔父省墓,往返千里,左右侍奉不少懈。”

看来,作为张世铨的长孙,他很可能代表张世铨,与三叔父张世志、四叔父张世惠一道,曾回歙县定潭故里展墓祭祖。其时,他年龄尚小(他去世时仅27岁)。虽然不见其他相近记录,但因宗法礼仪需要而与原籍的联系肯定存在。就张世铨一支而言,可能一直持续到望仙桥张氏分祠建成之后。

再次,突临的时局变故,可能使侨寓徽商与原籍间的联系再度强化,即便是暂时的。至少望仙桥张氏族人就有这样的事例。

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逼近上海。望仙桥的民众首次真切感受到了此前延续多年的战争的威胁。接下来的残酷岁月里,逃难、饥饿、乃至死亡,变得那样经常,以至于幸存者多年后的回忆还那么让人惊心动魄!民国年间望仙桥人杨大璋记录其父亲的逃难回忆中,就有这样一段涉及张氏族人:

“咸丰十年,太平军东下。四月,风声更紧。余时甫十龄,就学于里中,钱氏家人来呼,即随之至漳滨顾礼堂家。同行者,母氏程太夫人、兄莞山(讳惠泉)……

二十三日,与笑山等失散,中途遇张少仪世丈与学生数人同行。丈体胖,不良于行。遇一木桥,我与兄于人丛中挤过,丈则欲行又止者屡。乃涉水,余等立岸上候之。良久,突有呼来劫者,乃弃之而奔。”^{[17]87}

在这场浩劫中,望仙桥张氏族人遭受的打击也极为惨重。就死于战乱者而言,就有:

“张氏,监生承模女,生员程应杓妻。庚申五月五日,应杓骂贼被戕。氏抱尸哭,引颈受刃。”

“壬戌四月贼至,监生张承槐被执不屈,连受数刃,奋身清流,复被数枪死。”

“方氏,从九品张方荣原名承槐妻。壬戌四月二十一日死漳滨桥下。”

“承槐侄监生启鹏仓皇负母逃匿,母不能过桥,遂相守野庙中。贼至,驱之去,不屈,遂被害,年四十一。时家人星散,生死不知。后有目击者述之,而尸骨无可检矣。母归,穷饿卒,妇先已赴水……子志仁被擄而出。”

“杨氏,诸生契贤女,监生张启鹏继妻。壬戌四月二十一日赴水死。”

“张氏,启鹏女。壬戌四月二十一日赴水死。”

“张同椿,定潭人。承槐族祖,居里中。壬戌四月,忤贼被杀。”

“歙县张承枋字锦山妻。夫卒,居张干桥母家,苦节自失。壬戌四月自沈于河。”

“仲父(注:张青甫)二子先已被擄,先君子昆弟

三人赖以绵延一线。”^{[14] 84}

或许是想到了原籍歙县地处山区,数百年来兵戈未及,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较之于平原水乡的望仙桥,可能有更多的保障。有张氏族人遂不惮险途,回故里避乱。张世铎之孙张承柏即其中之一。同治十年(1871)二月他为钱门塘友人童奏云所著《劫余编》写跋时,有这样几句:

“余交童氏昆季,垂四十年。迹者慕迹相错,远者岁恒一二款洽。自往返新安十二载,东南酷罹浩劫,老成耆长,凋衰殆尽。”^{[16] 11}

从张承柏发出的这番物是人非的感慨看,此时他可能刚回望仙桥。若推测无误,则他返回歙县定潭故里当在1860年初,即上海的风声日紧之时。当然,历史与这位5旬左右的老人开了一个玩笑:故乡并没有给他和家人带来安全和幸运!在歙县的12年里,逃难和死亡给他留下了永远磨灭不了的记忆。

他曾在歙县各地躲避战乱。据其外甥陆世益回忆:“更可惜者,其(引者注:指外公张承柏)《宣南日记》等稿,系记当时黄山下避兵各事,大有史料价值,均被毁去。”

他的结发妻子也不幸在此遇难:

“严氏,生员昉女,生员张承柏妻。甲子正月,随夫歙县原籍遇贼,役使之,不从,割一耳、身被数枪死大雪中。年四十九。”

为此,张承柏伤心欲绝,赋诗一首《痛痛吟》:

“木拐零丁步不前,孱躯禁得雪漫天。卅年菜妇生离日,数岁娇儿道长年。我厌余生沦苦趣,汝真一死得长眠。餐刀饮血平生志,如此分张太可怜。”

四、结 语

结合上文的个案分析,笔者认为:大多数侨寓

徽商的土著化追求,其过程大体可以分解成一组建立在法律许可的“占籍”基础上的双线结构。一条是以修谱建祠为主要方式、以壮大宗族势力为目的的宗法层面上的子族建构;另一条是以扩大和巩固社会交流为主要方式、以提高社会认同程度为目的的社交层面上的网络建构。两者似有矛盾,其实殊途同归。而社会急剧变迁的动荡,是其土著化进程加速的催化剂。获得较多的参与地方社会事务的管理权利,是基本现实土著化的标志之一。撰修乡土志书,是侨寓徽商将土著化结论从社会公众认同的角度上确立其正统地位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 [1]王振忠.从祖籍地缘到新的社会圈[C]//赵华富.首届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文集.合肥:黄山书社,1996.
- [2]李琳琦.话说徽商[M].北京:中国工商联合出版社,2006.
- [3]唐力行.苏州与徽州[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 [4]张启泰.望仙桥乡志稿[M]//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乡镇旧志丛书(2).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 [5]许承尧.歙县志[Z].民国本.
- [6]童世高.钱门塘乡志[M]//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乡镇旧志丛书(2).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 [7]杨大璋.望仙桥乡志续稿[M]//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乡镇旧志丛书(2).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 [8]周庆云.盐法通志[M]//王振忠.明清徽商与维扬社会变迁.北京:三联书店,1996.
- [9](康熙)徽州府志[Z].康熙三十八年刊本.
- [10]费孝通.江村经济[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 [11](嘉靖)徽州府志[Z].嘉靖45年刊本.
- [12]赵吉士.寄园寄所寄[M].康熙刊本.
- [13](万历)休宁县志[Z].万历三十五年刊本.
- [14](顺治)歙县志[Z].顺治四年刊本.

责任编辑:张德学

A Case Study of the Localization of the Sojourning HuiZhou Merchants in Qing Dynasty -Centered on the Local Records of Wangxianqiao, Jiading District of Shanghai

Fang Guanglu

(HuiZhou Normal School AnHui Province, SheXian245200, China)

Abstract: The localization of Zhang's family reflected in the local records of Wangxianqiao, Jiading District of Shanghai shows that the localization of most sojourning HuiZhou merchants can be seen as a two-way structure built on the basis of the "Zhanji". One is a sub-clan construction on the level of the patriarchal clan system, aiming to strengthen its ethnic force by rewriting the pedigree of their clan and building ancestral temples; the other is a network construction on the social level, aiming to improve the social acceptance by expanding and consolidating the social communication. More involvement in local community affairs is one of the symbols of the fundamental realization of localization. Through compiling and rewriting Local Records, the localization has been firmly consolidated.

Key words: Qing Dynasty; Jiading; sojourning HuiZhou merchants; localization; case

志为中心

作者：[方光禄](#)，[Fang guanglu](#)
作者单位：[安徽省徽州师范学校, 安徽, 歙县, 245200](#)
刊名：[黄山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HUANGSHAN UNIVERSITY](#)
年, 卷(期)：[2009, 11\(2\)](#)
引用次数：[0次](#)

参考文献(14条)

1. [王振忠](#) [从祖籍地缘到新的社会圈](#) 1996
2. [李琳琦](#) [话说徽商](#) 2006
3. [唐力行](#) [苏州与徽州](#) 2007
4. [张启泰](#) [望仙桥乡志稿](#) 2004
5. [许承尧](#) [歙县志](#)
6. [童世高](#) [钱门塘乡志](#) 2004
7. [杨大璋](#) [望仙桥乡志续稿](#) 2004
8. [周庆云](#) [盐法通志](#) 1996
9. [\(康熙\)](#) [徽州府志](#) 康熙三十
10. [费孝通](#) [江村经济](#) 2001
11. [\(嘉靖\)](#) [徽州府志](#) 嘉靖45
12. [赵吉士](#) [寄园寄所寄. 康熙刊本](#)
13. [\(万历\)](#) [休宁县志](#) 万历三十
14. [\(顺治\)](#) [歙志](#) 顺治四年

相似文献(9条)

1. 学位论文 [李书艳](#) [清代以来嘉定聚落的时空格局演变](#) 2007

本文利用《嘉定地名志》的聚落资料为基础资料, 建立属性数据库, 参照纸质地图用GIS技术对聚落进行空间定位。在此基础上探讨嘉定聚落时间和空间的分布特征, 并分析其原因。从时间上看, 清代以前嘉定聚落数量已甚多, 但是由于战争、自然灾害等原因, 聚落大量损耗。清代聚落剧增, 构成现代聚落的主体, 清中期是出现聚落指数最高的时期, 清代嘉定数量呈持续增长趋势, 民国初达到聚落数量的高峰, 民国以后聚落数量逐渐减少, 尤其是建国以后聚落的消失甚多。从空间上看, 清代以来嘉定聚落扩展先是集中在东北部和南部地区, 乾隆时期已开始向中部扩展, 嘉庆时期向西部扩展, 开埠以后聚落扩展进一步集中在盐铁塘以西的望新镇和安亭镇。影响聚落的因素主要由水利、赋税、战争、自然灾害等因素, 建国以后影响聚落的因素更具时代性, 如工业化、城镇化对聚落影响甚重。

2. 学位论文 [周广平](#) [清代乾嘉时期学人诗研究——以“嘉定三老”为个案](#) 2006

清代乾嘉时期为考据学鼎盛时期, 其考据学成就为众多研究者所关注。是故, 人言乾嘉学人, 多言其朴学之考据成就, 而鲜有问津其诗歌之道。是故, 人多知学人之盛, 而不知学人诗歌盛衰之面貌。近年来, 学术界于乾嘉学人诗歌已有触及, 使得学人诗研究之边缘地位稍有振起, 然多为鸟瞰、综述, 既无个案性的典型分析, 亦乏鞭辟入里的群体剖析, 令人惋叹。清代乾嘉时期为学术繁荣时期, 学人辈出, 彼此交游唱和, 逐步形成一重要诗歌创作阵营。学人诗歌鼓荡于乾嘉诗坛, 俨然一时主流, 可谓盛矣。乾嘉学人诗歌承上启下, 上挽晚明诗风之空疏, 承清初汲古通经之余绪; 下导学人入诗之创作, 助推宋诗运动之波瀾, 引领当时创作走向。因此, 学人诗歌确实具有重要的诗史地位, 而其作为乾嘉特定时空下心灵生存状态的写照, 折射出学人智慧与个性之光彩。是故, 若无宏观之关照, 无从准确把握清代诗风嬗变之轨迹; 若不入学人诗歌之殿堂, 则难得其结构与规模, 也就无法确切理解学人诗歌之内涵。因此本文选择清代乾嘉时期学人诗歌为研究对象, 又选取“嘉定三老”为典型研究, 从宏观上, 意在重置学人诗歌之诗史地位; 从微观上, 以三老为案例, 具体而微, 发掘学人诗歌之精微, 尝鼎一脔, 或可得其中滋味。故不揣浅陋, 欲以此小文, 引得诸方家昆仑之玉。文章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 包括学人与学人诗、学问与性情。“学人与学人诗”一节主要是对学人的概念进行了界定, 对学人诗的发展流变的过程进行了考述; “学问与性情”一节主要论述了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在诗质上的差异, 强调学问与性情并不相碍, 两者相济, 方可文质并茂。第二部分是清代乾嘉时期学人诗综述, 包括朴学与清代学人诗群之崛起、乾嘉学人诗群简谱、“嘉定三老”与乾嘉诗坛。“崛起”一节主要从文化背景、当时的文化政策与机制两方面切入, 对学人诗歌在乾嘉时期崛起成因进行了考释, 是对学人诗歌创作心态与背景的探究; “诗群简谱”一节是乾嘉时期学人诗人群像巡视, 是对学人诗歌研究整体性的观照; “‘嘉定三老’与乾嘉诗坛”一节阐释了之所以选择“嘉定三老”作为乾嘉诗坛学人诗的代表, 是出于史的架构需要, 以及他们自身诗歌成就所具典型意义上的考虑。第三部分就“嘉定三老”的诗歌——包括古拙朴淡的潜研堂诗、雅健生新的王鸣盛诗、醇和博雅的王昶诗, 分别进行分析、论述, 从认识价值、审美取向、诗歌内容、诗艺成就等方面入手, 论其得失, 评其优劣, 力图窥乾嘉学人诗歌的整体风貌。第四部分是在前人学人诗已有诸多贬抑之后, 再语清代学人诗, 对清代学人诗的整体风格进行了论述, 以重新审视其诗史地位。

3. 学位论文 [刘明明](#) [嘉定与宝山慈善事业的时空差异\(1724-1928\)](#) 2006

本文通过对清代及民国初年民间慈善组织在嘉定、宝山二县发展始末的对比分析, 论述了两县在四个阶段各自的发展特点。两县本由同一县析置

，但在后来的慈善事业发展上，却姿态各异，主要是受到粥厂赈济原则差别的影响。另外文章还从慈善机构的设置和善举的兴办上，探索了国家政策在地方慈善事业兴办上的正负作用。

4. 期刊论文 [侯富芳 钱大昕佚序两篇略述——中国典籍与文化2006\(3\)](#)

钱大昕是我国清代最有名的学者之一，其著作宏富，成就特出。1997年由陈文和先生校点之《嘉定钱大昕全集》是其著作之集大成者。然而，仍有不少遗漏。近几年钱氏佚文的整理工作亦取得不小成绩。在此基础上，本人从《四库未收书辑刊》中得其二史言行略序、《爰先类纂序》佚文二篇。

5. 期刊论文 [李强. Li Qiang 清正廉洁以民为本——清代名臣陆陇其政绩述评——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 29(2)

清代名臣陆陇其，在任嘉定、灵寿两县县令时以清正廉洁而著称。他从“民为邦本”的传统儒家思想出发，锐意求治，积极为百姓减免赋税、打击豪强、移风易俗，堪称清代为官者的典范。

6. 学位论文 [白爱平 姚贾接受史 2006](#)

中唐诗人贾岛、姚合是具有独特地位的一对诗人组合。他们极端苦吟的创作态度、奇涩精警的五律体制、清寒幽僻的艺术旨趣，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晚唐姚贾诗人群体、唐末五代姚贾后学、宋初九僧等晚唐诗人、南宋永嘉四灵及江湖派、明末竟陵派、清代高密派和同光派等诸多文学流派，都在效法姚贾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诗歌风貌。因此，姚贾在中国诗歌史上的接受过程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现象。共时接受阶段，贾岛因为有韩孟等人的推扬，其怪变峭拔而终归平淡的诗歌风格、苦心推敲嗜诗成癖的创作态度，在元和年间即有名望。而姚合则在长庆初年创作了《武功县中作》等组诗以后方获得诗坛声誉。在贾岛偃蹇潦倒而姚合仕途渐趋通达并且乐于接纳后进的情况下，姚合逐渐成为姚贾诗人团体的实际领袖人物。此派诗人大多兼师姚贾二家，也有更接近于姚合者。他们的诗歌有从拗峭尖新逐渐向清畅浅切过渡的趋势。

唐末五代时期，张为撰《诗人主客图》，以姚合为“清奇雅正”主李益的“入室”，贾岛为“升堂”，这是后世合称姚贾的肇始。齐己在其《还黄平素秀才卷》诗中首次将姚合、贾岛置于对举的地位。这时期的姚贾并称尚停留在个案性的阶段，没有达到大众化的普遍认识。晚唐五代时期是姚贾诗风广泛流行的时期。姚贾后学从章法起结到奇崛警句，从总体风格到表现内容，全方位地承继姚贾五律，不过鲜有青出于蓝者。在审美情趣上，表现出对僻涩峭硬风格的自觉修正和向平易冲淡作风的进一步靠拢。北宋时期，诗歌史上第一次有了“姚武功”和“贾岛体”、“浪仙体”这样的称谓。“姚武功”三字见于《新唐书·姚合传》，说明武功县中诸作最为世人传诵。“贾岛体”则首见于欧阳修的《弹琴效贾岛体》诗题，指一种好用复词、音节回环往复、风格幽奥冷峭的五言古诗。北宋末人马令《南唐书》卷十四中，提出了“浪仙体”这一称谓，用来指一种苦心琢磨、对仗精工的五言律诗。由于欧阳修和苏轼等大文学家的倡导，人们更多谈论的是“郊岛”，而非“姚贾”。以宋初九僧为代表的晚唐诗人，延续了晚唐五代以来潜脉暗流的姚贾诗歌传统，将目光投向风花雪月一类寻常景物，笔调轻闲小巧，风格清苦工丽。不过意象更单调，形式更呆板，情感色彩更单一，基本上没有超越姚贾的藩篱。

南宋时期是姚贾接受的繁荣时期，这时期真正出现了姚贾并称的说法，并且得以大行于世，逐渐成为一个相对固定的诗学名词。赵师秀编选的《二妙集》问世以后，贾岛姚合清冷寒僻的诗歌旨趣，在南宋发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姚贾”并称开始取代“郊岛”并称出现于宋人文本。据现存文献中资料考察，“姚贾”二字最先出现在释永颐于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或稍后创作的《悼赵紫芝甫》诗中。“贾岛姚合”四字最早出现在宁宗嘉定十一年(1218)丁焯书张飞《秋江烟草》卷首。在整个诗歌史，南宋时期是姚贾后学诗人唯一一次摆脱诗坛偏裨旁支的身份，步入一个浩大潮流的时代。四灵诗派展示了清新精练的姚贾面貌，在江西与理学诗风泛滥之际，获取了文学发展史上的独特地位，并迅速地进入了诗坛主流。正是他们的努力，使得风靡一时的江西诗风则自此式微，这一力量的消长又给了江湖诗派一个崛起的契机。江湖派是一个既有永嘉四灵、也有江西诗派影响的集合体。其中姚贾一脉对于诗歌艺术的专注和体认，使中国诗坛产生了重要的变化。姚合贾岛是在无法仕进或无奈仕途的情况下才用诗歌的方式消解生命的苦难，而江湖诗人则明确地将诗歌视为人生第一目标，诗歌创作朝着她本身的文学性的方向又前进一步。金代是姚贾接受最为沉寂的时代，读者没有独特的见解，只是延承前人的观点。我们甚至找不到姚合的身影。姚贾作为整体，没有被这一时期的读者重新认识接受的迹象。姚贾诗歌在元代时诗坛处于相对不受重视的地位，方回所编《瀛奎律髓》多论所选姚贾诗歌的句法、对法、格律等具体作诗技巧，还对二人诗风的不同之处作出了具体分析，认为姚诗卑弱细巧，贾诗瘦劲高古。虽然方回的诗学主张不离江西习气，但对作为江西诗派对立面之永嘉四灵以及姚贾诗歌，能够作出相对客观中肯的批评议论，是难能可贵的。

姚贾诗风在明代始终处于主流的批评视野之外，持续着元代以来的冷落萧条。明人开始将姚贾诗歌作为整个文学发展史的一个有机链条，探讨它们在元和诗坛上呈现出来的延承和新变，这是姚贾接受史上极有意义的批评实践。另外，各种版本的《姚少监诗集》和《长江集》的刊刻、传抄，使得姚贾诗歌在事实上拥有了更为广泛的阅读者。万历中叶以后，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上承姚贾、四灵一脉，下启清代高密、同光派，以急激激宕、幽深孤峭的诗歌风格，续写着姚贾接受史上的独特篇章。他们以一种深幽孤峭的僻冷风格，来纠正当时诗坛上俚俗、浅露、轻率的公安派流弊，用姚贾遗绪来建构他们另类诗人的艺术殿堂。他们与姚贾风格的亲近，正反映了与正统文学的疏离。清人除了继续传播着“姚贾”、“郊岛”这样的诗学名词，同时出现张、贾两诗派之说；对姚贾诗歌的鉴赏渐趋细致，各种诗评文字层出不穷姚贾诗歌入选各种总集、选集、类书、方志的数量增多；姚贾本集的刊刻本、传抄本继续着明代以来大量涌现的势头，为二十世纪姚贾的理性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高密诗派研中晚唐人格律，远承姚贾的寒瘦瘦真。他们以张贾标榜，力图融汇张籍诗的雅正和贾岛诗的清苦。在他们中间，不乏规模较阔、出入唐宋诸大家之间的诗人。同光诗人则在清代诗歌史上发生过重大影响，其中追随姚贾清峻深峭风格的主要是陈衍、郑孝胥、陈宝琛等同派诗人。他们效法姚贾苦吟的创作态度、幽峭冷僻的艺术旨趣、奇涩精工的五律体制，但贾岛寒士不平的矫激气格，姚合以史为隐的自适情怀，却是身处动荡末世的他们所难以描摹的。

二十世纪以来，姚贾接受与研究逐渐渗透到各个方面，学者在姚合贾岛的生平事迹、作品真伪辨辨、诗集整理和版本研究、诗歌艺术方面的研究、诗歌渊源影响和地位的总体评价、苦吟问题、“武功体”的初步探讨、姚贾并称及姚贾异同、郊岛并称及郊岛异同等方面取得了各自不同的研究成果，其深度和广度超越了以前任何一时代。姚贾五言律诗的大面积重现的不可能性和姚贾诗歌鉴赏研究的普遍繁荣，反映了其永恒的艺术魅力。纵观中唐以后诗歌的发展，后学诗人对姚贾的继承，基本上呈现出两种倾向：其一是由僻涩峭冷向平澹细巧过渡的趋势，其二是由亦步亦趋趋向转益多师发展的趋势。他们一般都没有占据当时诗坛的主流地位，艺术成就也总是无法企及新的高度。不过这种生生不息的绵延流行，仍旧在中国文学接受史上留下了幽奇卓异的独特篇章。

7. 期刊论文 [章夫 少年邓小平的故事——党史文苑（纪实版）2009\(2\)](#)

1901年，16岁的邓绍昌与广安淡家坝(今广安恒升镇)淡氏姑娘结婚。淡家也是广安世家大族，清代家庭中便有人在湖北省通城、江苏省嘉定和甘肃省渭原出任知县。淡氏18岁嫁到邓家。1902年他们的女儿邓先烈出生。1904年8月22日(清光绪三十年七月十二日)，一个幼小的生命“呱呱”的啼哭声，从离“德政坊”百米开外的瓦屋里传向世间。他就是邓小平。

8. 学位论文 [乔芳 曹植集及《曹集论评》研究 2008](#)

曹植的作品一直以来就深受人们重视，研究的学者也很多，但是关于曹植集的版本，一直未有系统的梳理。本文主要涉及各时期曹植集的版本问题以及各版本之间的承继关系。最早的曹植集由曹植本人撰录，但今已佚，未有流传。其后出现了他人编写的曹植集。从卷数上讲，曹植集经历了由三十卷本到二十卷本，最后十卷本的过程。宋代的十卷本中有几个很重要的版本，南宋孝宗间江西大字刊曹子建集十卷本、南宋嘉定六年刊曹子建集十卷本、北宋元丰五年万玉堂曹子建集十卷本。它们是后世众版本的基础，尤其是南宋嘉定六年刊曹子建集十卷本，更是许多版本的母本。清代以来，出现了曹植集的注本，如丁晏的《曹集论评》和朱赓曾的《曹集考异》。本文重点考证了晏其人和《曹集论评》的成书过程和版本情况，以及篇目、编排体例辑佚、正误、补脱和注文研究。

9. 期刊论文 [郝淑霞 竹刻艺术漫谈——文物春秋2008\(3\)](#)

竹刻艺术主要流行在我国南方各地。考古资料证明，早在战国时期就有了竹刻艺术品，明中期以后竹刻艺术发展成熟，成为一个专门的艺术门类，并在江苏地区形成以朱松邻为代表的嘉定派和以濮仲谦为代表的金陵派这两大流派。清代是竹刻艺术的发展繁荣期，人才辈出，流派纷呈，把中国竹刻艺术推向鼎盛。

